

禪宗佛學思想論集

真禪
著

真禪
著

禪宗佛學思想論集

上海玉佛寺法物流通處

新學
佛學
研究

PDG

禪宗佛教思想論集

目錄

禪宗及其禪學思想為何盛行不衰	(一)
再論菩提達摩的禪法	(二〇)
慧可禪學思想的特色	(二九)
僧璨和他的《信心銘》	(三六)
道信在禪宗形成中的主要貢獻	(四〇)
弘忍的禪學思想	(四九)
六祖慧能的禪學思想及其傳承	(五九)
神秀的禪學思想及其傳承	(七三)
神會的禪學思想及後人的評析	(八三)
虛雲和尚及其禪學思想	(九四)

禪學思想就是人間佛教思想		(一〇四)
我對如何運用禪學思想的一點體會		(一一〇)
後記		(一一五)

禪宗及其禪學思想爲何盛行不衰

禪宗作為中國特有的宗派，在隋唐時處於極盛，幾乎代替了整個佛教。其禪學思想，更是滲透到我國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直至當代，禪宗及其禪學思想，仍然在世界範圍內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紛紛加以弘傳。在中國，現今開放的名山大剎，絕大部份都是屬於禪宗的寺廟。而研究禪宗及其禪學思想的風氣，也方興未艾。研究禪宗及禪學思想的著作，不斷問世，前後陸續出版數十種，專門研究與弘揚禪學的刊物也已有多種。在海外，研究禪學之風更為盛行。在英、德、法、美等國，禪學研究特別發展。這些國家的一些學者，甚至把禪宗看成是中國文化和宗教的代表。因此，不僅介紹和研究禪學的書籍大量出版，而且陸續建立了一批「禪文化研究中心」、「禪學研究中心」等等的組織和團體。

為甚麼禪宗及其禪學思想從古到今能够盛行不衰？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在這裏，這談幾點個人的看法，以就正於大家。

一、禪宗的弘傳方式有其獨到之處

禪宗從菩提達摩開始，即宣揚「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禪法。菩提達摩傳法給其弟子慧可的故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相傳菩提達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後，萌生了回歸故土的念頭，於是將他的所有弟子都召集至面前，準備將自己的衣鉢傳給他們中悟得了禪的真諦之人。他對弟子們說，你們有誰知道禪的真諦？有位名叫道副的弟子說：禪雖然不執著文字，但文字是求道的工具，故不應捨棄文字。達摩聽了便說：你得到了我的皮。一位法號總持的比丘尼說：禪如慶喜之見阿閼佛國，一見便不再見。達摩聽了說：你得到了我的肉。又一位弟子道育說：四大皆空，五蘊非有，世界宇宙，不存一法。達摩聽了仍不滿意地說：你得到了我的骨。最後，慧可默默地走出弟子的行列，向達摩行了一個禮，又站回原位，不發一語。這時，達摩便說：你得到了我的髓。於是就將自己的衣鉢傳給了慧可。

又如五祖弘忍傳法於慧能時，慧能作了一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看了這首偈句，知慧能已真正理解了佛性大意，但不動聲色。次日潛至慧能的碓坊，見慧正腰石舂米，弘忍即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慧能豁然有悟，即於是夜三更，悄悄來到禪堂，密見弘忍，弘忍即為其說《金剛經》。當說到「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時，慧能頓時大徹大悟。於是，弘忍就將衣鉢傳給了慧能，為禪宗六代祖師。

這種傳法方式，簡捷方便，無須長年累月的誦讀經典，無須論資排輩，無須經過一次的考核，祇要對祖師的啟示有所領悟，就能一下子得傳禪法的衣鉢。這種「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禪法，對廣大信徒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二、以山林作為弘傳禪法的據點

禪宗是一種山林佛教，它扎根於山間農村，以深山老林作為弘法的根據地。相傳達摩來到中國後，一開始在當時的建康與梁武帝晤談不契，他即感到在大城市向帝王、大臣宣揚佛法，困難甚多。於是即北上洛陽，以嵩山少林寺為中心開始傳授禪法，最後將衣鉢傳予慧可。

慧可在嵩山少林寺跟隨達摩六年，傳得達摩衣鉢後，即至舒州皖公山（今安徽山東北）潛修佛法，最後授法予僧璨。

僧璨得法後，又隱居於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太湖北），據稱是蕭然靜坐，不出文記，而且是不傳法，但還是有弟子道信隨侍左右，前後九年，得其衣法。

道信受法後，先是至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傳法，後又往湖北黃梅雙峯山（一名

破頭山)，一住三十多年，主張「坐禪守一」。最後傳法於弘忍。其另一傳法弟子法融，後到金陵（今南京）牛頭山傳牛頭禪。

弘忍得法後，即於湖北黃梅雙峯山之東馮茂山另建道場，名東山寺，時人稱其禪學為東山法門。其禪風「蕭然靜坐，不出文記，口說玄理，默授與人」，開中國佛教特有的禪風，對後來禪宗的發展影響甚大。

弘忍的弟子甚多，其中比較有名的有：

法如、老安，後來形成嵩山禪系；

玄蹟，後來形成楞伽禪系；

神秀，後來形成兩京禪系；

智詵、宣什，後來形成四川禪系；

慧能，後來形成韶州禪系。

其中慧能在得法後，即南歸廣東，曾隱居山林一十六載，「混農商於勞侶」，以後才至韶州（今廣東韶關）曹溪寶林寺弘揚頓悟法門。

從上可以看出，禪宗自達摩至慧能（弘忍的另一弟子神秀除外），都是以深山老林作為弘揚禪法的根據地的。這種遠離大城市、遠離皇室、官府，在深山老林弘傳禪法的做法，便於接近廣大的下層勞動者，從而獲得更多的信徒。

三、禪宗的理論適應廣大佛教徒的需要

禪宗的理論，提倡「心性本淨，佛性本有，見性成佛」。這主要是依據達摩的「二人」、「四行」學說發展而來的。所謂「二人」即「理人」和「行人」。「理人」是憑藉經教的啟示，深信衆生同一真如本性，但為客塵妄想障蔽，不能顯露，必須令其捨妄歸真，通過坐禪「壁觀」，掃蕩一切差別相，所謂「無自無他，凡聖等一」。使自己的認識與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無為。這可以說是禪宗的理論基礎。「行人」即「四行」：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與稱法行。這是屬於修行實踐部份，它要求人們做到無怨無怒，無愛無憎，無得無失，無悲無喜，甘願忍辱受苦，無所希求，最後與禪觀內證所得之「真性」之理相應。

達摩的「二人」、「四行」之說，當時相當流行。慧能繼承這一學說，主張捨離文字義解，直徹心源。

慧能在《壇經》中提出：「於自性中，萬法皆見」。「萬法盡在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認為祇要認識自己的本心、本性，就可即身成佛。

慧能在《壇經》中所闡述的禪宗思想，最為重要的是發揮了「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論思想。《壇經》中載有慧能初拜弘忍，師徒間的一番問答。其中慧能說：「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大師遂責慧能曰：「汝是

嶺南人，又是獼獠，若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這一番問答，可說是《壇經》一書的宗要，也是慧能創立的禪宗南宗理論的中心之點。其後禪宗各派，皆圍繞這一中心理論而展開。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論思想，自曇無讖譯出《大般涅槃經》以後，幾乎為中國所有佛教派別所承認。祇有法相宗仍堅持「五種姓」說，認為有一種無性有情，畢竟不能成佛。但這種說法，受到多家的攻擊，因而其影響很小。慧能在《壇經》中重新提出這種「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論思想，仍然有其十分巨大的意義。因為「成佛」是所有佛教徒共同追求的目標，如果有人畢竟不能成佛，那學佛修行還有甚麼意義呢？因此，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這一思想深入人心，受到千千萬萬佛教徒的熱烈歡迎。

《壇經》中所載慧能在初拜弘忍時的一番相互問答，除了宣揚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思想，肯定會受到廣大佛教徒的歡迎和擁護外，還含蘊着另外一種極為深刻的現實意義，即宣揚民族平等的觀念。如《壇經》中弘忍提出慧能是獼獠不堪作佛時，慧能立即理直氣壯地回答說：「獼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我們知道，「獼獠」是我國古代對南方少數民族的一種貶稱。在弘忍看來，成佛作祖祇能是中原的「華夏之地」的人，邊緣地區的少數民族是不行的。慧能打破了這一陳腐的觀點，大力宣揚民族平等的思想，公開宣揚少數民族同樣可以成佛作祖。這種思想和理論，應該說具有巨大的進步意

義。

正是由於禪宗南宗的理論中，含有這種人人皆有佛性，各民族人民都有成佛作祖的可能，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佛教徒，使得禪宗長期來盛行不衰。

四、農禪並重的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禪宗：本以修習禪定而得名。但是，從四祖道信開始，即打破了這種局限，提出了勞作和坐禪並重的口號，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農禪並重」的原則。道信在傳得僧璨的衣法後，到湖北黃梅雙峯山，聚集五百徒衆，定居在那裏三十多年。他們一不靠官府的政治上的支持，經濟上的資助，二不靠向施主的募化，而是提倡作（務）坐（禪）並重，自給自足。他們自己開墾土地，這些土地屬於僧團羣體所共有，平等勞動，平等消費。這種農禪並重的原則，為道信以後的歷代祖師所繼承，並有所發展。弘忍在東山傳法授徒，當時被稱為「東山法門」，也是提倡僧人都要參加勞務。慧能在弘忍處學法，弘忍也是命其隨衆作務，劈柴踏碓。慧能得法後，回到嶺南弘揚禪法，更是堅持並發展了這種農禪並重的禪風。當時弘忍的另一弟子神秀，和一部份禪僧及其宗系，受到官方扶植，以正宗自居，放棄了農禪並重的原則，從而出現了宗派的分立和糾紛，以後就有了「南能

北秀」的對立。這種對立，表面上是非官禪與官禪（即沒有政府支持與有政府支持）的鬥爭，其背後則蘊藏着有農禪與非農禪的分歧。而南宗的勝利，實際上標誌着農禪的勝利。因此，也可以這樣說，禪宗最終取得成功，最後壓倒其他一切宗派，幾乎取代其他一切宗派，主要在於它堅持了這種僧侶自己勞動、自己生活的自食其力的原則，也就是農禪並重的原則。

自覺總結農禪的經驗，明確提出以農禪並重作為禪僧必須遵守的原則的，是百丈懷海禪師。他於百丈山開堂說法，高倡南宗之旨。自己以身作則，凡日常作務必先於衆僧，常常勞而忘食。特別是他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號，後來成為所有禪僧的行為準則。正是由於懷海創立的這種風範，才使得禪宗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因為從百丈山懷海那裏出來的禪師，後來都成為禪宗五家繁盛的骨幹。

勞動進入禪門，禪僧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使得僧侶由寄生轉入自覺，這無疑是佛教的一個偉大的變革，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時至今日，我們僧人仍然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仍然發揚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而獻出我們的全部光和熱。我想，這也是禪宗及禪學思想至今盛行不衰的原因之一。

五、禪宗有一整套的叢林清規和寺院管理制度

佛教在古印度，祇是「三衣一鉢，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沒有具體的僧衆日常應遵循的規定。禪宗的百丈懷海禪師，根據禪宗僧伽發展的需要，製訂了一整套寺院僧衆日常必須遵循的制度，名為《百丈清規》。這個「清規」規定了法堂、僧堂、方丈等制度，建立了僧人日常行持、說法、普請（勞動）等規則。其中特別規定僧侶在修道的同時，必須參加農業生產，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過農禪的生活。

「清規」還規定了一整套寺院管理制度。其中管理一寺的稱住持（亦稱方丈、堂頭和尚）。住持下設執事僧，一般稱為兩序，即西序頭首和東序知事。西序有前堂首座和後堂首座（統領全寺僧衆）、書記（執掌文書）、知藏（掌管佛教經籍）、知客（負責接待外來賓客）、知浴（掌管浴室）、知殿（管理佛殿、法堂的香燈）等。東序有都監（總管寺務）、維那（領衆薰修，執掌僧衆威儀進退綱紀）、副寺（掌管財務、總務）、典座（管理飲食、住宿等）、直歲（管理寺內勞務）等。現在懷海製訂的《百丈清規》雖早已失傳，但是元代德輝禪師參照了唐宗諸家清規，依托百丈之名，重行修訂，取名《敕修百丈清規》，至今仍為全國僧衆所遵行。

正是由於有了禪宗所訂的叢林清規，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寺院管理制度，才使得今天的各大寺院，雖然法務繁盛，香客、遊人衆多，仍然能够管理得井井有條，忙而不亂，而佛教奉行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那種農禪並重的優良傳統也得以堅持和發揚。

我們上海玉佛寺，就是依據禪宗所留傳下來的叢林清規的精神，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寺院管理制度，繼承和發揚了農禪並重的道風。

我們玉佛寺的管理制度，採取了禪宗的叢林制和現代民主管理制度相結合的辦法。全寺最高的民主管理機構，是在上海市佛教協會領導下的寺務委員會。其組成人員有：

主任：由方丈擔任。

副主任：由都監、監院、居士各一人擔任。

委員：由監院五人，維那、僧值、職工代表各一人擔任。

寺務委員會下設辦事機構寺務處，其組成人員有：

主任：由都監擔任，主管包括財務在內的寺內外一切事務。

副主任：由監院一人（分管法務活動和外事接待）、居士一人（分管素齋部、法物流通處和上客堂）擔任。

其他成員由監院四人組成，分別管理上海佛學院、庫房、法務活動、安全衛生等。

寺內執事則有：

知客：負責接待外來賓客。

維那：領衆薰修，執掌僧衆威儀進退綱紀。

副寺：掌管財務、總務。

僧值：管理寺內勞務和上殿過堂修持。

殿主：管理佛殿、法堂。

由於管理寺院制度比較健全，分工明確，各項工作都能緊張而有序地進行。玉佛寺每天平均接待外賓、僑胞和臺港澳同胞約有千人以上，初一、十五及佛教節日，進廟人數達二、三萬人。如此繁重的接待任務，能夠有條不紊地進行，與禪宗留下的管理制度分不開。

玉佛寺還遵照禪宗留下的農禪並重的精神，組織全體僧衆、職工，發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優良傳統，堅持參加素齋部、法物流通處、上客堂等各種服務性勞動。全體僧衆也保持了良好的道風。他們每天上殿做早晚功課二次，逢初一、十五集衆到禪堂坐香，齋堂誦戒。農曆臘月初一至初八在禪堂舉行禪七，其間停止寺內一切活動，杜門謝客，一心辦道，自身修持。農曆四月初一至初八，舉行華嚴佛七法會，由方丈講經。清明和冬至，分別舉行佛七法會。佛、菩薩誕辰，舉行祝誕普佛法會。

玉佛寺發揚農禪並重的道風，受到海內外信徒的讚揚。

正是由於禪宗有一套完整的叢林規制和寺院管理制度，所有佛教寺廟，不論其為何種宗派，都遵守奉行，所以禪宗在中國乃至海外，仍然盛行不衰。

六、禪學思想影響到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

禪宗雖提倡「不立文字」，但實際上其哲學思想却相當豐富。從隋唐時代禪宗形成的時候起，其禪學思想就在逐步中國化的基礎上對中國哲學思想有所影響。唐以後，其影響就更大了。宋元明各代的理學家們，包括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諸大家，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可以說大都有「出入於佛老」的治學經歷，都曾接觸過禪學思想。因此，在他們的思想體系及其著作中，都帶有禪學思想的痕跡。有人說，宋明理學，從表面上看是儒學，實際上是「陽儒陰釋」或「儒表禪裏」。也就是說，它表面上是儒學，骨子裏都是禪學。這種說法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因為我們看到，宋明理學的思維模式和修行方法等等，處處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例如，禪宗的「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論思想，它的「明心見性」的修行方法，在宋明理學中，幾乎隨處可見。因此，可以這樣說，沒有禪宗，沒有禪學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就不可能有宋

明理學的存在和發展。清代的一些哲學家，大都繼承了宋明理學的傳統，因而在他們的哲學思想體係中，也都留有禪學思想的痕跡。

由於禪學思想對中國哲學思想，特別是對宋明理學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因而為後來禪宗及禪學思想的流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七、禪學思想為近代思想家和學者所重視

近代一些思想家和學者，大都重視對禪學思想的研究。他們有的將禪學思想豐富自己的理論體系，有的把禪學思想作為革命鬥爭的思想武器，有的將禪學思想作為科學研究對象，從而推動了禪學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復興。這裏簡要地介紹幾位近代思想家、學者重視和研究禪宗和禪學思想的情況。

譚嗣同，是近代思想家，也是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中的激進分子。他曾在變法中莊嚴地宣告：「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戰，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表現了他為追求真理而不惜犧牲的精神。在他被捕入獄後，曾題詩於獄壁「我自橫刀向天笑」。臨刑前又喊出：「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現了他對反動勢力毫不畏懼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他的這種大無畏精